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学习、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能不弄清楚它与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关系，弄清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带有深刻的历史标记和时代烙印。

一方面，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必定要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需要。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步履维艰，一波三折，归根到底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失误分不开。其主要表现是长期以来，我们由于对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作了教条式的理解，结果把许多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附加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加以坚持；而把许多本来是为社会主义所要求或者所允许的东西，却当作资本主义的因素予以反对。结果在政策上和工作指导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在实践上，固守一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使本来应当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

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需要采取特别慎重的科学态度：当年马、恩勾画未来社会时提出的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最重要论断，当然仍是我们今天必须肯定和坚持的，但是对于马、恩社会主义学说中与社会主义实践不相适应的个别原理，则不能抱住不放；对于我们自己过去长时期中因对马、恩学说作了教条式理解而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则更应当坚决纠正。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亟需在坚持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不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坚持。为此，就必须在理论上提出并解决好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亟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通过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重新认识，系统地清理和批判“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同时深刻阐释和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才能为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创造绝对必需的思想理论前提。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使党有可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冷静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重新规划前进的轨道，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既是基于客观的必要性，又具备客观的可能性，顺理成章，势所必然。也正是有赖于这一再认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本历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的逐渐形成与完善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迄今已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期间，我们

党和国家经历了许多极为重大的事件，召开过多次具有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会议，产生过许多闪烁着科学社会主义灿烂光辉的重要文献。其中可以作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阶段性标志的主要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首次尖锐地批评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病，从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向全党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历史任务。全会的《公报》按照这一精神，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分析了它们的原因和危害，阐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大体上规定了改革的方向。这是实际上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全部历程，就是以此为起点的。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召开六中全会时，已经有了三年的实践经验，再结合研究“文革”的历史教训，使党有可能就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始作深层的理论思考。《决议》指出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应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十个“主要点”，逐一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这个概括是对三年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更是对十年“文革”严重教训的深刻总结，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决议》还首次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重要论断，为以后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有力的铺垫。因此，《决议》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方面，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实际上已经开始勾画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

——1982年党的十二大。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的宏伟纲领，并且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六个方面的特征，即：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括，今天看来虽有不尽确切之处，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进步。特别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又一个重大进展，并且为继续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进一步指明了总方向、总目标。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破除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论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并且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当然，现在看来，《决定》在理论上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如实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新的飞跃。因此，邓小平同志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上的突破，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它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并且制定了它的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这就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和内容具体化了，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

主义再认识的一个拓展和深化。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并且把它们概括为十二条，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尤其是，报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生产力标准理论，在理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建树。十三大报告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构建了比较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使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0 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认识”，并且把它概括为十二条原则。这十二条原则，说的是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的中国化和具体化。这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次深化。

——1991 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括为在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每一方面的基本要求中，又具体地规定了“必须”做什么，“不能”和“不允许”做什么。这是对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十二条原则所作的更加精辟的概括和提炼，使之获得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相当完整的基本政策体系。所以，这同样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又一次深化。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谈话》阐述了一

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对由他首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发挥。《谈话》尤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一是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从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究竟要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只是从制度特征以及如何维护制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片面性。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的基础和核心。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最系统完整的表述，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所达到的最新境界。尤其是报告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一步，首次明确地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全面、系统和严密，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到又一个新的阶段。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是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宏伟蓝图。它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了，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因此，它的产生，意味着十四大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深化。

以上就是十五年来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本历程。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实践经验的日渐积累和理论上的积极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地由浅入深，由现象到初级的本质再到更高级的本质，由某些局部和方面进到全局和更多的方面。也正是在这一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构成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十五年来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取得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以下仅是举其荦荦大者。

一是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再认识。历史证明，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首先应当解决究竟是从什么出发的问题，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呢，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出发，从某种早已设计好了的固定不变的模式出发，从某些外国的经验出发，从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这个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问题。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几经曲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始终如一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别国特别是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把自己的主观设计理想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且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共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个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做法的统一，归结到一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统一。因此，这一科学命题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指导思想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

二是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再认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清，或者把现阶段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混同起来，用过渡时期的一套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来处理现阶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或者把现阶段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等量齐观，勉强地在现在去干将来才能干的事情，从而导致了許多错误，尤其是“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有可能冷静下来反思过去，重新研究中国的国情，清理了过去种种超越阶段的“左”的观点，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十三大又把这一论断发展为一个理论，从而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现实国情作了高度的科学抽象和概括。这一理论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根据，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确立了立论的依据。

三是关于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直接相联系，两者曾经长期地困扰着我们，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1956年党的八大已经就此作出基本正确的论断，但是时隔不久即被推翻，重新突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把“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根本任务，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这是往后二十年的长时间内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我国经济建设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行了再认识，彻底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新肯定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论著中，经常地反复地强调发展生产力的严重意义，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大大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首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最根本任务”。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富有新意的深刻论断，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四是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没有说明在阶级矛盾只是有限地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50 年代中期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们党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这些矛盾；但可惜的是从中引出的结论不是必须进行改革，而是要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其结果不是推动，而是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还是认为唯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结果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再认识，果断地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深入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即革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所以，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新的深刻的革命，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总之，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要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在改革中前进。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的再认识中确立起来的关于改革的观点和原则，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鲜活泼、最富有生气和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

五是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再认识。这一再认识的内容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并且由此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在过去一个长时间内，我们往往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同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否认它们之间的任何继承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直接导致搞自我封闭，闭关锁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汲取这个历史教训，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现在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十多年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显著成绩和宝贵经验，重申：“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

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些关于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同样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最充满时代气息、从而最富有青春活力的组成部分。

此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上，也都是在不断进行再认识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经验，酝酿和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和内容。

对以上所有这些方面的再认识，总起来说是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和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二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道路、方法和途径，形成了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在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和在不断的再认识中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之所以取得伟大成果，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我们党能够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冷静地反思过去，汲取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认真地正视现实，总结新鲜的经验。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工作中频频失误，反复折腾，其性质也比较严重。而一切工作中失误的根子，在于理论上的失误。我们党是一个严肃

的光明磊落的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的原则立场。这就使党能够以极大的勇气，从思想理论入手反思过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纳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同时，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仔细地倾听实践的呼声，不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出新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五年，是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产生的时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开始奠定的时期，是中华大地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开辟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时期。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伟大的理论。我们党面对如此丰富生动的伟大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时予以总结、提炼和升华，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不断扩展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是因为我们党能够妥善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个别原理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注意防止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总的指导原理”。它包括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理论表现；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论点和公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上述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严密、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真理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则是马、恩、列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个实际问题提出的理论观点、口号或公式，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的特点，有的已经不适应于今天的形势，有的不适用于中国的环境。因此我们党认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

不行的，不冲破某些已经过时的、被实践证明为不完全正确的个别原理而代之以新原理也是不行的。既要防止和反对借口坚持基本原理而不敢冲破已经陈旧过时的个别原理的思想僵化的“左”的倾向，也要防止和反对借口冲破已经陈旧过时的个别原理而不去坚持乃至否定基本原理的自由化的右的倾向。十五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在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进行的。反对错误倾向，主要应当是防止“左”，但也要警惕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旨在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和背离，这与自由化的鼓吹者借“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之实，迥然不同。这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这一再认识所以能够健康地进行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是因为我们党能够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准确抓住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的核心问题——生产力标准而予以重点突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论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后，紧接着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这是一个含义非常深刻的重要论断。生产力标准问题之所以成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的核心问题，是因为：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力的状况中寻找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的根源的，这与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去解释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同在其他一切社会中一样，生产力标准是一个衡量进步与落后、判别是与非的客观的物质标准，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

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所以，不能离开生产力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否则就会陷入主观随意性和空想社会主义。第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说到底是要改变自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确立新的社会主义观。而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最大缺陷，是不从生产力的角度看问题，不承认或事实上否认生产力标准，从而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误入“左”的迷雾。因此，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要确立新的社会主义观，就必须抓住生产力标准作为核心问题来解决，也只有这样，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事实证明，十五年来，举凡我国现在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之所以必须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要坚决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之所以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学习与利用资本主义的长处等重大问题，都是由于联系我国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生产力标准，才得到了正确的说明和科学的论证，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一直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的一个最大困难和阻力，其根本原因，仍在于离开生产力标准而抽象地看问题。因此，必须亮出生产力标准这面旗帜，来正确引导这场争论。十三大以来，更确切些说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们党就是这么做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为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在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判断我们所走道路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而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标准，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是因为我们党能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和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想前人之所未想，言前人之所未言。无论

是反思历史教训还是总结新鲜经验，也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冲破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过时的个别原理，以及选择生产力标准作为核心问题而予以重点突破等等，这一切，统统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就是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通过对社会主义再认识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原则、理论观点，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所以，只有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能深刻理解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真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十五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取得的伟大成果令人鼓舞，但这不是极限和顶峰，而只是这种再认识在现今条件下所达到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理论和许多方针政策，也有待于在实践的检验中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所以，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认识运动，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开展下去，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扩展和深化，同时也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经历了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前几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再到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漫长曲折的过程，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仍然是我们现在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口号。

（写于 1994 年 2 月。载浙江《理论学习》1994 年第 5 期和
北京《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 年第 8 期）

论当前解放思想的若干问题

一、大胆解放思想是我们始终必须坚持的基本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及其影响，确定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方针。十六年来，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党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进步。这是十六年历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

解放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总是要以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亿人口长期受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对外关系上又是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度里，思想观念的先导作用，更加具有突出的和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是不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那末，什么党的复兴，国家的发达，民族的兴旺，只能统统成为空话。

造成十年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党要重振，国要重兴。在我们党内，最先敏锐地觉察到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

性，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巨大的勇气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推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在一系列的谈话和讲话中，就反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1977年4月，他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就给中央写信，针对所谓“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①；同年5月，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②；7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③。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这场讨论；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详尽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或“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④；9月，在一次谈话中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他还批评像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现在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之僵化！明确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⑤。1978年12月，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11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128页。